

抗戰建國論

侯外廬 著  
生活書店發行

# 抗戰建國論

侯外廬著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

# 抗戰建國論

實價國幣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侯外廬

發行者 生活書店

漢口：交通路六十三號

勝州：漢民北路五十號

重慶：武庫街二十一號

西安：馬坊門街

上海：成都梧州桂林

貴陽：昆明蘭州宜昌

長沙：萬縣衡陽金華

香港：南昌南鄭天水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初版(渝)

## 自序

這本小冊子的內容，是想把關於抗戰建國綱領中的主要問題，從理論方面給與以原則上的研究與探討，使這些問題的認識更深入於科學的領域。

前三篇是關於民主政治的，第四篇是關於經濟建國的理論的，第五篇是關於目前國際形勢與外交政策的，第六篇是關於青年運動的，這些問題都是我們現在所要迫切了解的課目，本書的目的想借破磚能夠引起全國人士的寶玉。

本書與拙作統一戰綫論爲姊妹篇，我們可以說是中國問題本身上不可分離的兩個側面的研究。

「綱領是說還沒有東西」，所以新中國目前運用全力要實現的國策 都靠抗戰建國綱領在政府與人民中間的認識與施行，我們要努力使「還沒有的東西」發展而爲

『已經具有的東西』（憲法），更須首先展開綱領的討論才是

本書甚期待着嚴格的批評！

外廬・一九三八，六，三，四頁。

# 目 錄

抗戰建國與民主問題·····	一
中山先生的民權論與民主建國·····	三
抗戰建國中民族問題的民主號召·····	四
關於抗戰建國綱領中的經濟建設問題·····	六
目前歐洲形勢的認識及我們的外交政策·····	七
青年對於抗戰建國的任務·····	九

## 抗戰建國與民主問題

### 一、有歷史內容的民主

首先，我們知道歷史上絕沒有過純粹的民主，所謂民主亦不是研究室裏計畫成功的一種萬世不移的疆死的公式，反之它是歷史階段中適應現實發展的國家形式之一。

『民主制是國家的形式，是國家的各種形態之一，因此，同一般的國家一樣，民主制也是對於人民的一種有組織，有系統的強力之使用。而另一面，民主制又是在形式上承認一切公民平等，承認一切公民都有平等權利來決定國家建設和管理。』

所以，民主制『決不是一個不可超越的界限』，而是從較低級較狹隘的平權到『逐漸擴大的』平權，從形式上的平等到接近於實質上的平等之長期歷史發展運動，民主制愈是完備，則牠變成廢物的日子愈近。最後民主問題就不上歷史的日程了。

## 二、抗戰民主的建立

在抗戰過程中的民主，與其說是爲了建國民主之目的，毋寧說是爲了抗日最後勝利的手段。我們知道『民族問題是民主問題的一部分』之大戰前具體的指示，更知道『民族問題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之大戰後具體的指示；我們在目前抗戰階段，正確的具體認識，應當是對內的民主服從民族問題的對外民主。從前文化界有『抗日第一』呢，或『民主第一』呢，兩面的爭論，這種無代價的爭論，原因是不了解民主問題中具體的歷史概念，歷史內容會把問題設置於第一或第二的位置中。

在抗戰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之原則下，抗戰的民主，被有些人強調着民主制的前一義諦，即強調着『對於人民有組織有系統之強力使用』，以增進抗戰力量，這也是誤解抗戰民主的本質。因爲我們知道，從前我們在內戰過程中，對於人民的強力使用，不外是封建性的強制；在今日我們並沒有達到有組織有系統的條件，不但沒有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條件，却也沒有資產階級專政的條件，那麼對於人民強力的使用，恐仍是一種封建性的無系統無組織的強制，如利用保甲制度而強徵壯丁便是。葉青君所自造的一個名詞什麼『專政民主』，好像把開明專制和無產階級專政，都等一性地認做一種強制吧？

臨代大會宣言謂，抗戰依賴民力，而民力與民權（民主）則相為因果，這已經指示出抗戰民主的端倪。這主要內容是喚起民衆與改革政治機構之兩點抗戰建國綱領上的規定。

第一點，我們可以說是由下而上的民主運動，第二點可以說是由上而下的民主改進。二者的相互配合的發展，可以達到抗戰民主的完備程度。

中國在某方面亦好像前世紀的德國，一方面苦於封建制度的頑固，他方面復苦於民族資本發展的不足，所以亦同樣如資本論序文所言，『為死的所苦，復為活的所苦。』因此在德國，『不要使一八六六年到一八七〇年的「由上而下的革命」往後倒退

，應該用「由下而上的運動」來補充牠。」

在目前抗戰期間，我們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的民主問題，更嚴重於當時的德國。一方面「貪污官吏，甚於漢奸，」形成阻障民衆動員削弱抗戰力量之腐性機構，他方面在敵人所佔領的後方，最落後的封建殘餘被敵人收買而企圖建立漢奸政權，以遂敵人以華利華的野心。而這兩方面的政權形式，都是民主形式的對立物；因而民主運動，在我們的後方，應以『由上而下』的民主革命爲主，而副以『由下而上』的民主運動，在平等的號召之下，相當地給與公民以平等權利而參加政治，增厚抗戰力量，只有這樣的民主形式，才能容納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動員精神；在敵人的後方，則主要『由下而上』，澈底建立民主政權，在政府領導之下，使已成立的漢奸政權，由民衆的力量施行摧壞，使準備成立中的漢奸政權，由民主的游擊政權的建立所克服，目前由中央命令之晉冀察邊區政府的民主政權，實在是一個最好的模範。

『戰爭是革命的熔爐』，我們在抗日過程中，敵人的大炮落到『中國的活的頑石

『上』，沒有把頑石粉碎，相反地倒使『頑石』點頭，這一頑石頭點的意義，便是從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中，給與了我們以鍛鍊的最好條件。封建剩餘在這一長期抗戰的大熔爐中，好像腐敗細胞之在一個熱症的病體中，會由環境的壓力，而趨於死亡，祇有新生的細胞組織才會健全地克服熱症的壓力。這種生理的克服，在抗戰的過程中便類民主勢力的戰爭發揮精神一般。反之，我們一任舊的封建細胞作祟，那麼不但不能挽救危亡，而且會把整個民族葬送墳墓。同時，我們亦要担心那熱病的續發症，不使腐敗病菌，發展於身體部分，這種以腐菌害新的生機之發展亦可以致命，亦猶之乎在失地的一隅，以華制華的漢奸政權的建立之發展，可以致中國民族於危境。

抗戰建國綱領，在抗日過程中，是一種新生的號召，由這新生的號召產生一種新生的抗戰力量，這種抗戰力量的形成，便是『抗戰民主』的主要精神。在第二期抗戰中，我們曾經獲得了相當的勝利，軍事的勝利是和政治的進步相互配合着。我們爲甚麼當聞到津浦路的捷報時，同時獲得到抗戰建國綱領的公布呢？這不是偶然的，亦猶

之乎當聞到蘆溝橋的炮聲時，同時就聽到廬山談話的『應戰』指示。後者抗戰開始的政治形勢，與前者抗戰轉機的政治形勢，都不是偶然的。從後者新生開始的號召，發展而為前者新生充實的號召，那是由於新生的民主力量發揮的開始，發展而為新生的民主力量發揮的充實。我們在抗戰民主堅決的進一步發展中，還有更新生的號召，更新生的力量，甚至更新的抗戰勝利的局面。

抗戰民主建立運動，不但是——個形式的號召，應是一個『逐漸擴大的民主制』，使民主制部分地真實地實現於抗日過程的爐火中。

抗戰民主的新的力量，大於過去中國社會的一切力量，這不是抗戰前可以準備為先驗的東西，而是在抗戰發展中逐漸進步而為嶄新的力量。因為不健全的政治機構以及以華制華的漢奸存在，有社會的基礎，我們的抗戰民主是和這二種惡社會環境奮鬥的，一直到抗戰勝利為止。

### 三、抗戰民主是什麼呢？

現在我們要問什麼叫做「抗戰民主」呢？

自然，歷史上沒有這個名詞，亦沒有過這樣的民主階段，這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過程中特有的一種國家形式，反法西斯世界戰爭中半殖民地革命任務所自己規定的一種民主制。這裏面的意義有兩方面：

一、「民主的意義就是平等」，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暴力的革命過程中，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所領導的人民戰線國內戰爭，形成了「兩極相逢」的雙翼，這一偉大的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運動，主要的號召是保障「民主」，要求「民主」。所以，「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而爲自己解放的鬥爭中，民主制有極偉大的意義。但是民主制却決不是一個不可超越的界限；他是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的階段之一。」在先進國家今日推翻法西斯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民主運動成了一種基本的任務，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如果不一個簡單的二國軍事戰爭，而是反法西斯保障世界和平運動的一環，那麼中國在全

世界大民主號召的空氣中，中國不能不有配合世界潮流前進的運動，而且必然要在抗戰過程中培養扶植起中國社會所特有的低級的民主，這一性質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從這裏講，民族問題不但是民主問題的一部分，而且實在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

二、在中國抗戰過程中，一方面適應戰爭的發展，中國須依賴所謂『民力』的動員，這與『民主相爲因果』的民力動員，必然是一種手段性的民主形式，消極性的民主形式；他方面『民主制決不是一個不可超越的界限』，在戰爭過程中所培養而興起的『民力』，是從過程中產生出來一種新社會力量，新社會大衆所執行抗戰任務的力量。在平等民主形式下所喚起的新力量，必然形成社會的新內容。爲了配合新內容的國家形態，那麼改革政治機構的更民主的發展，便不單止於手段性的界限，同時復是目的性的積極性的民主形式。尤其在敵人後方與漢奸政權積極鬥爭所建立起的民主地方政權，更顯示手段與目的之統一。

抗戰民主所以是更低級的性質，就因爲對內民主服從對外民主（對外政治上的民

主，即民族解放）這裏所謂對外民主自然是中華民族整個的獨立意思，而不是指國內諸部分漢蒙回藏等民族問題。在這裏，我們所以還不能理想地要求憲政式的對內民主，就因為抗戰民主是戰時民主的一種過渡階段，是與軍事發展相配合的一種新的政治機構階段。

抗戰民主的最低限度的任務，在於建立反貪污反漢奸的，遂行積極動員民衆的政治機構；同時在於融洽我國諸部分少數民族並使自主的參加政治的廣泛政治機構。抗戰民主，最重要的，是在抗戰過程中，要積極淘汰腐朽動搖不定的份子，而廣泛容納進步的抗戰最力的新的社會力量，使抗戰的民主號召的形式，與抗戰犧牲的民主權利的內容，相配合起來。抗戰的民主平等的形式，同時亦是抗戰的民主自由的形式。平等的形式，是喚起民衆的不二法門，同時自由的形式是民衆自我教育的無上命令，臨代大會宣言謂，三民主義是具有『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民意之需要』的精神，我們以爲抗戰民主的建立，正是革命的三民主義之在新潮流與新民意之下的偉大精神。

## 四、到建國民主之路

我們知道，抗戰民主是一種最狹隘的民主，「形式上的平等」，距離實質上的平等很遠，而建國的民主之精神是盡最大可能的努力使距離於實質上的民主較近。

我們不能在書齋裏瞎想，我們要根據現實的發展而細密地思維。建國的民主，不是天然的圖畫，由一個藝術家去運用想像力構繪，牠是抗戰民主的發展階段，因而是由抗戰民主發生出來的更高級的民主形式。

抗戰的民主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之基本條件，沒有民主條件的發展，最後勝利是難於期望着的。反之抗戰民主發展愈高度化，愈有望於取得最後勝利。同時愈具備好後一階段建國民主的物質條件，愈順利的轉變到建國之路。所以，建國的民主，與其說是在將來建國階段中建立着，毋寧說是在目前抗戰階段中發展着，因而將來建國的民主是如何距離於實質的民主，要看抗戰民主在統一戰線中的發展條件。



然而，至少我們可以說，在抗戰過程中的民主發展，同時便是新社會力量的形成的發展，這種新社會力量，常大於社會全體。猶之乎，在抗日軍事發展上，第二期抗戰由戰略戰術，物質與精神，以及民衆配合諸方面所發展出之新力量，九個月由教訓中發展出的力量，大於準備了數年的全部。新的社會力量，參加抗戰的各階級各政黨的民主權利，無疑地要在建國過程中尋求最好的適應的民主新形式。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是擴大矛盾以培植矛盾的軍事冒險，因而在其戰敗時復員的當兒（其實帝國主義在歐戰中戰勝國家，復員的結果亦是社會動亂），那所遭受的結果恐怕是社會革命。

我們的抗戰，因為是革命的，民族解放的，故到抗戰勝利的時候，是革命的光榮歷史。這一光榮的歷史，首先修改了中國半殖民地的國際地位，隨着這一記錄，由抗戰過程中所發展出的新社會力量，必然提出新的歷史的命題。這一命題大書着；中華民主共和國。

民族革命戰爭，使全國民衆，由抗戰民主的扶植，在這時已經準備好解決民主共和國的物质條件；如果不開倒車，就要開着革命的歷史火車頭前進，所以臨大會宣言中說：『民衆方面則注意於能力之養成，政府方面則注意於機能之適應，此固所以充實抗戰之力量，而民權（民主）之基礎，亦於此建立，則抗戰勝利之日，結束軍事，推行憲政，以完成民權主義之建設，而勢固至順也。』

「推行憲政」是一個原則，試問這是新統一戰線建國的各黨各派各階級的民主政治呢？還是爲一般人還要曲解的所謂不通的「一黨專政」呢？是各黨各派所共有而共育的民主政治呢？還是一個階級的獨裁呢？

理論上沒有謊話的，我們建國的民主，既不是純粹的民主，又不是最實質的民主，如果要說是實質的全民的民主，那「民主」已經在博物館中陳列起來了，或者已經是字典上的工作了，因爲那不是說到了共產主義的高階段麼？

那麼，中華民主共和國是什麼樣的民主呢？

## 五、建國的民主是什麼呢？

有些人常說，中國建國是『非資本主義的』，這等於說是非牛的，非馬的，而沒有規定了問題。

有些人亦說，中國建國是社會主義的，這是犯了急性病的一種希望，並沒有了解中國社會在脫離帝國主義羈絆時，即半殖民地民族解放後，自己歷史發展的本質。

誠然，在中國建國開始之日，從帝國主義世界的沒落程途上講，建國民主沒有典型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歷史，從中國社會的經濟構成上講，亦不可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歷史。典型地由封建制到資本主義的過渡階段的民主，與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的民主，在中國歷史上全不會有的。

因為，前一個過渡階段，是純資產階級的法權（平等），在形式上空虛地把民主建立起來，私產權利與勞動權利同時支配着社會，事實上這是所謂『富人的民主』；

在後一階段，部分地還保留着資產階級的法權，雖然承認個人私產的法權被取消，『而還沒有消滅給不同人們之不等量（實際上之不等量）勞動以等量生產品之這一資產階級的法權。』事實上這是所謂『貧人的民主』。

我們的建國的民主，既不是前者，更不是後者。第一：我們還不能夠消滅生產資料個人私有的法權。那就不是『貧人的民主』；第二：我們復依照世界歷史的發展與教訓，不可能只在形式上發揮資產階級的法權，資產階級形式的平等，使陷於『富人的民主』。

我們又知道，『貧人的民主』，雖然保留着資產階級的法權的一部分，但是這已經『成爲各份子間生產品分配與勞動分配的調節者（決定者）。』法權的內容已經改變了，因此，中國的建國，在承認資產階級的法權全部皆存在的原則上，可能使法權本身的内容改變了。私產的法權，可能發展而爲不是神聖的法權。私產在生產過程中可能發展而爲計劃的部分。

我們爲什麼說這是資產階級法權的民主呢？因爲我們沒有社會條件消滅資產階級的法權。然而，我們爲什麼說這又不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呢？因爲我們在世界史中進了一步，並非純粹接受資產階級形式的民主，而可能在接近於民主實質上去進一步否定資產階級的形式騙局。這是我們建國的特有的民主制，我們的歷史把我們規定了的。

這樣的憲政的民主，決不是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以抗戰勝利過後各階級力量，在新的形勢之下，共同建立共和國的半殖民地解放後的特殊民主。如果具備着新的條件，這才有社會主義的前途。

建國的民主之主要任務：是削滅封建殘餘，計劃國家生產，光大民生主義調整階級利益，保障直接生產者的最高民主權利，勵行澈底的社會政策，實行大多數民衆的勞動政策，消滅官僚制度實行澈底的地方自治，承認國內少數民族的自治，削滅文盲提高文化水準，等等。

這又不是所謂「適乎世界潮流，合乎民意需要」麼？我們不應當形式地了解潮流與民意，主要地要從世界史的發展與中國新社會力量的發展，而把握現實的潮流與民意。

因此，我們不能不研究抗戰勝利前途的條件，和其對於建國民主的關係。

## 六、抗戰勝利的條件配合與建國民主的程度性

中國抗日民族解放勝利的前途是有條件的，這條件已經被一位導師指給我們：

「反帝國主義的解放戰爭，不僅是可能的，不但是可以指望的，而且是必不可免的，進步的，革命的，雖然爲要保證這種戰爭之勝利，當然要有：或者被壓迫國內巨大數量之居民共同努力（例如我們引作例證的印度和中國內數萬居民之共同努力），或者國際形勢中種種條件之特別的配合（例如帝國主義列強因其本身勢力之削弱，因其彼此進行戰爭，因其彼此對抗等等而無法實行干涉），或者某一個強大國家裏無產

階級同時舉行反資產階級的武裝起義（最後舉出一個情況，從無產階級之觀點上看來，乃最合希望和最有利的情况）。』

第一、我們本身的條件，即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巨大數量之居民共同努力』。中山先生曾指示我們要學習俄國革命的方法，伊里奇先生亦說蘇俄『戰鬥勝利的歷史對於東方弱小民族是有極大全世界的意義……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革命戰爭，如果真能喚起千百萬民衆，便能產生可能的奇蹟，根據蘇聯共和國所有的經驗看來，東方民族的解放現在是完全能實現的。』前世紀馬克斯已經指示出帝國主義在中國將逢見什麼呢？那是自由，民主共和國。目前中國人士皆已有此信心，如孫科先生在英國的談話，便根據這樣的經驗昭告世界。

第二，帝國主義法西斯的世界戰爭，在目前對於我們最順利的配合，便是和平陣線國家的反侵略運動，如果這一陣線的發展到對侵略者的程度，那麼國際形勢的特別配合便成爲我們勝利的條件。

第三 便是法西斯國家的內亂，無產階級的反法西斯統治的革命，這對於我們是有最大的幫助力量的。

第四，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保障世界和平的武力堡壘以及社會主義勝利的物質條件，將給與中國民族解放成功的一大支柱，同時這一社會主義向全世界的模範的發展，還是前三個條件的有力支持條件。

我們民族解放的成功前途，主要還是根據於第一條件的自己『共同努力』的統一戰線之鞏固與擴大，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所產生的新力量，才是爭取最後勝利的基礎力量，同時可以保障勝利的發展以至於建國之路的真力量。

我們抗戰勝利的前途，如果在以上四種條件皆具備的場合，那麼建國民主的內容是最高度的，因為不但我們自己具備着保障勝利的新力量要素，而且全世界的環境已經將脫離資本主義支配世界的國際關係，我們在那時候的建國，不但能克服本身的阻力，而且沒有國際帝國主義的某種阻力與干涉，尤其在日本帝國主義本身發生社會革



命的條件之下，東亞版圖顏色已經改觀，我們建國的民主，很順利地即有社會主義的前途。

復次，我們抗日勝利的前途，如果只具備內部的條件：則建國民主的內容是可能為相當高度的，然而却因外部的阻力以及帝國主義的經濟關係之束縛，或新的離間中國社會關係的政策，而受相當的痛苦。因了對付外部的國際環境，便要減少內部民主發展的價值。反之：如果祇具備外部的條件，則我們的成功是一種僥倖，建國的前途雖然因民族解放的勝利，可能向前邁進，而民主的內容却是較為低度的。但所謂低度的民主，亦有等級性的，因為外部的條件，有後三種條件一齊具備，或一種具備，或兩種具備之不同，故對於中國建國的民主是有彈性的影響。

最後，我們抗日勝利的前途，如果具備着內部的條件，同時亦具備着外部的條件之一種或二種，則建國民主的內容，比只具備內部條件之場合者更高度些。但，所謂更高度些的民主，亦有等級性的，因為外部條件的三種性質不同，故對於中國影響亦

不同，假若具備着外部條件的第三種，則中國建國問題的民主性質便稍高，假若法西斯國家一齊因無產階級革命而崩潰，則中國建國的民主更稍高；反之，假若是具備着外部條件的第二種，則中國建國的民主便稍低。我們還可以說，第二種外部條件或第三種外部條件和第四種外部條件的配合亦是不同的，這一配合的不同，影響於中國的建國民主亦有差異。

所以，我們對於中國建國的民主，祇能說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式的民主，這是一個原則，這一原則是有社會主義的前途，可能和平轉到社會主義的前途，沒有什麼『不斷革命』的前途。但是，民主性質的內容，却不是死的形式，先驗的範疇，而本身是發展的，因各種不同條件的配合有相異程度之發展前途。

伊里奇先生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澈底時，即打開了轉到社會主義的門戶。』中山先生『民權與社會主義相連帶解決』的遺教，和馬克斯評論德國革命的前途，可相為印證。詳旨另論。

## 中山先生的民權論與民主建國

### 一、民權，民主，民治是一個名詞：德模克拉西（Democracy）

民治，民權，民主的翻譯文字，都是由日文裏介紹過來的，都是『德模克拉西』譯語，有時亦譯做民治主義，民權主義，民主主義。在『五四』時代，有人始直接音譯做『德模克拉西』，因和『塞因斯（Science）』並提，把前者簡稱『德先生』後者稱爲『塞姑娘』。

中山先生說，所謂民權，『德模克拉西』此乃希臘之古名詞（民權主義第二講九二頁）。『凡事都是應該人民作主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第三講三四一頁）所以，民權主義和民主主義，在中山先生學術中是異名同實的概念。『民權是人民去管理政治』的意思，所以便含着民治主義一概念。不過因『政權』與『治權』的中山先生的分類，避免概念的混雜，故不使用『民治』這一概念。近數年

來中國論壇中的譯文，或用音譯「德模克拉西」或用意譯「民主」，這不是和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顯示異途，而恐怕是因中山先生把「德模克拉西」含義規定了很多具體的屬性，形成一個系統，不便混駁的原故；其實還是一個義諦。形式的問題，不是問題的中心。

## 二、中山先生對於民權（民主）的歷史觀點

我們知道，民主是有歷史內容的，是發展的，不是一個空虛的絕對物，亦不是一個「不可逾越的界限」。歷史上有古代式的民主，有資產階級的民主，有無產階級的民主。由低度陔隘的民主，發展而為高度的或接近實質的民主，是歷史的進步。

古代的民主是奴隸制的民主，是少數人的民主，所以中山先生說：

「希臘羅馬名義上雖然是共和國家，但是事實上還沒有達到真正的平等自由，因為那個時候民權還沒有實行。譬如希臘國內便有奴隸制度。所有貴族都是畜役多數的奴隸，全國人民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奴隸，斯巴

邊的一個武士，國家定例要給五個奴隸去服侍他。所以希臘有民權的人是少數，無民權的是大多數。」（第三講一二頁）

這是古代奴隸社會貴族專政的民主，極其低度的民主。

嚴格地講來，民權或民主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物，『平等思想，是商品生產關係的反映』。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一方面是歷史的最大的進步，他方面則局限於其民主的虛詐性，『依照其本性，對於一切平等問題，慣用着抽象形式的態度。資產階級聲言無產階級與私有財產者，被壓迫者與壓迫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暗地則欺騙被壓迫者。』然而這不是說，『爭取民主制鬥爭會是本來的錯誤』，『相反地，若不為民主制作普遍的鬥爭，則不能準備自己去戰勝資產階級。』尤其在法西斯把資產階級的民主統殺的現階段，保障民主的鬥爭成爲目前全世界人類的共同課題。

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各講中，極力贊揚歐美的民權革命，稱之爲這是『順應世界的潮流』，稱現代爲『民權的世界』，在中國，『革命黨於宣傳之始，便揭出民權主

義，來建設共和國」。然而，中山先生並非自限於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不但不故步自封，反而給與了歐美的民主制以嚴格的批判。嚴厲地，批評資產階級的民主之狹險性，他說：「照現在世界上民權發達國家講，人民在政治上是佔甚麼地位呢，得到了多少民權呢，就最近一百多年來所得的結果，不過是一種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過一種代議政體。」（第四講一三二頁）這種「各國到了代議政體就算止境」（同上）的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中山先生稱之為「流弊」，這種流弊傳到中國，他說祇產生了些「豬仔議員」（同上），距離民主的實質很遠。

「近來俄國新發生一種政體，這種政體，不是代議政體，是人民獨裁的政體（意指無產階級專政）。這種政體究竟是怎樣呢？我們得到的材料很少，不能判斷其究竟，推想這種政體，當然比較代議政體改良得多。」

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據現在我們所得到的材料看來，足夠了解其民主的進步高度性了。據列甯先生說，其改良多的程度，比代議政體（資產階級的民主）進步了一百萬倍，距離實質的民主甚近，不是中山先生所謂的少數人的民權，而是廣大

數人的民權。它也祇能如中山先生偉大思想的推斷。「改良得多」，不是如資產階級的形式觀念下的所謂「一般的民主」。

中山先生所謂的「民權世界」，現在已經有點改觀，中山先生所贊揚有「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第一講八四頁）的提倡民權的盧梭，如在今日將為法西斯魔王認做猶太人殺了。現在法西斯將使世界歷史回到中古農奴制的黑暗境域，所以中山先生民權革命的號召，應當在全世界上強調的。

資產階級的民主，據中山先生說，「在歐美雖然遇了障礙，也是自然發達，不能阻止。因為大勢所趨潮流所至，沒有方法可以阻止。英國貴族知道世界民權的大勢，能夠順應潮流，不逆反潮流，……一八三二年准普通平民有選舉權。」美國民權運動開始後，「歐美自法國以外，像丹麥荷蘭葡萄牙西班牙那些小國，於不知不覺中，也發生民權風潮。」第四講一二六頁）至於德國一八六六年的革命，本質上是所謂「由上而下」的革命，牠是一種進步，所以恩格思說應從「由下而上」的革命補充牠。這

種補充還是民主革命。因爲一方面，俾士麥的改良政策許與工人階級以某些民主權利，他方面復利用「官僚主義的國家集中制」（恩格思語）限制民主自由。這一後者的限制意義，用中山先生的話講來，便是「中央集權的獨裁政治」（第十四講一二九頁）。同時中山先生又說明這是「俾士麥反對民權的很大手段」，或「使用國家的力量去代替人民，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成了民權的障礙。」（一二〇頁）

資產階級的民主，是一種形式的平等，因而是狹隘的民主。所以中山先生說：

「歐美平等的流弊，究竟怎樣呢？簡單說來，就是他們把平等兩個字，用得大了。歐人爭得平等以後，爲甚麼緣故，發生流弊呢？就是由於民權沒有充分發達，所以自由平等還不能夠向正確的道去走。……所以歐美人民乎今還是要爲民權去奮鬥。……工黨是革命以後，人民爭得了自由，才發生出來。最初工人不知道自己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不知道受資本家很大的壓迫，後來許多熱義之士，替工人抱不平，把工人與資本家不平等的道理宣傳到工人頭上，把他們才喚醒了。」（第三冊一一三頁）

所謂太呆的平等，是資產的法權（平權），這有兩個意義，一，「無產階級與私



有財產者在法律上的平等』，二，『不同的人們之不等量（實際上不等量）勞動被與以等量生產品之平等』，前者是所謂私產的法權，後者是所謂工資勞動的法權。資產階級把這種法權形式化一般化，稱爲『純粹的民主』，形成一種騙局。偉大的思想家中山先生把這點揭發出來，稱爲『太呆的平等』概念。所以他說：『德國的民權雖然很發達，但是沒有力量去反抗政府。在俾士麥執政時代，他的能力，不但在政治軍事外交種種方面戰勝世界，就是對於民權風潮也有很大的手段戰勝一般民衆（作者：註中山先生稱俾士麥的獨裁爲民權的『第三障礙』，現在希特拉根本抹殺民主，在中山先生看來，所謂『國家社會主義』更是民權障礙物的反動了）。然而到了德法戰爭以後，世界上不但是有民權的戰爭，並且發生經濟的戰爭。……另外發生一種東西，就是社會主義，這種主義就是我的民生主義。這種戰爭，就是工人和富人的階級戰爭。德國的社會主義，在那個時候，便非常發達。社會主義本來和民權主義相連帶的。這兩個主義發生以後，本來應該要同時達到的。』（第一二六頁）民主『沒有充分發達，所

以自由平等不能夠向正軌道去走』，而是向富人的民主方面去走，因而經濟戰爭的社會主義不能不同時發生。當初『美國自脫離英國獨立以後，把從前政治的階級完全打破，創立共和制度，以後法國革命亦是照美國一樣，把從前的階級制度根本推翻。』自然這裏所謂推翻了的是指封建貴族。『延到現在六年以前又發生俄國革命，他們也打破階級制度，變成共和國家。就這三個革命成功的國家比較，發起最後的是俄國，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國。俄國革命的結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階級打到平等，並且把社會上所有的資本階級，都一齊打到平等。』（第三講一〇七頁）

俄國革命便是社會主義和民權主義同時解決的課題，所以不但沒有把平等弄得『太呆』，而且比資產階級的民主改良得多，牠已經消滅了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法權，私產的法權。雖然尚保留着資產階級的他部分法權（形式上還是呆一點），即工資報酬制度，然已經變更了內容，已經『成爲各分子間生產品分配與勞動分配的調節者（決定者）。』內容上已經不是『呆』的了。中山先生說他的三民主義已經實現於俄國，

只怕是指這一點吧？

在今日，民主制度，因了法西斯戰爭的瘋狂，成爲世界革命的中心問題，有的國家，如中山先生所謂成功最大的民主國家蘇聯，應當發揮積極的民主的制度，模範的「不呆」的民主精神，有的國家如法英等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應當盡量地爭取較寬大的充分些的民主，有的國家如法西斯德意日，應當爲保障較狹隘的民主制度而鬥爭，如中國，根據中山先生的遺教，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所建立的自己新式的民主，雖然是資產階級法權式的民主，而本質上却要求「不呆」的內容，如中山先生所謂「駕乎歐美」資產階級民主之上的民主。中山先生所謂民權世界，是「順乎世界潮流」的運動，故『中國決定要採取民權制度』。

### 三、民權（民主）是進步的，不是抽象的類概念

中山先生的民權論，不但沒有局限於資產階級的自覺手段，即假象化於所謂「一

般的民主』或『純粹的民主』之形式騙局方面，反而因『社會主義與民權主義相連帶』的『解決，使民權理論發展了，進步了。

在初期的資產階級的民主理論，恆常把民主認識爲一個抽象的類概念，靜止的絕對物，先天的範疇。例如盧梭的絕對的資產階級的民主理論，是由其『人性論』的絕對的天賦自由平等概念出發。盧梭的政治理論，和亞旦斯密士從『人性論』『自私心出發的自由競爭之經濟理論』是如出一轍的。資產階級的自覺手段，如法蘭西的機械的唯物論與英國休模洛克的哲學，形成了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理論，故當時的政治哲學與經濟科學亦祇能在本階級的自覺手段方面參加意識的革命，這種『毫無顧慮』的素樸態度，可以說是科學的態度（馬克斯批判李加圖語）。他們爲了使資本主義絕對的合理，所以在意識形態上亦建立起絕對的抽象類概念來，這對於當時階級的革命是忠實的。所以，中山先生的批評說：『民權不是天生出來的，是時勢和潮流所造成的，故推到進化歷史上，並沒有盧梭所說的那種民權事實……我們主張民權的，不必要先

主·張·言·論·，因·為·宇·宙·間·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實·，然·後·才·有·言·論·。」（第一講八三頁）這一接近於現實發展與理論發展的道理，足夠批評『天賦權利』（八三頁）說的抽象的類概念。中山先生說：『中國革命所以決定採用民權制度』，一則為順應世界之潮流，二則為縮短國內之戰爭（八六頁），所以，民主的內容是有歷史性的，是進步的，可以隨歷史而變質的，不是一個先天的範疇。這一點，是中山先生民權論的最大成就，超越了資產階級的自覺手段，然而中山先生在理論上雖反對形式主義的民權論，在人類進化史上却對於這種民權主張給以極大的推崇，贊美『盧梭提倡民權的始意，更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

關於和民主範疇相為連帶的自由平等的範疇，中山先生亦有精闢的見解。自由平等，也和民主一樣，不是形式與內容一致的絕對的東西。自由與必然的統一，由歷史的發展做內容，才能達到『自由的王國』，至於民主亦不過是『形式上的平等』，由形式的平等，逐漸發展而為具有更多內容的平等，接近於實質的平等。世界上絕沒有

純粹的自由平等。資產階級的理论家，却把自由平等規定爲『不可逾越的限界』，中山先生在理論上給與了以下的批判：

『少數有知識學者……相信天生人類都是平等自由的，爭平等自由是人人應該有的事。……之後，民衆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這一說，想達到人人的平等，殊不知這種事是不可能的。科學昌明，人類覺悟了，才知道沒有天賦平等的道理。』（第三講一〇四頁）其實，平等祇是形式的平等，是人爲的平等，『所以，我們講民權平等，又要使世界有進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爲平等是人爲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祇能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一〇五頁）

在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無產階級與私有財產者祇有法律上的平等，同時自由勞動者的報酬，亦祇有在事實上不等量勞動上給與等量生產品的分配，所以資產階級的全部法權，是形式上的平等，中山先生稱之爲人造的平等，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即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前一資產階級的法權取消，後一資產階級的法權，也尙未取消，故

『盡能取值』的社會，還帶不平等內容的形式平等。到了『盡能取需』的社會，才能使平等自由接近於實質，然而到了這時，一切民主、自由、平等，都已經隨國家機器的消滅也消滅了，因為民主本身便是國家形式之一，這時祇有在博物館找民主，自由、平等的概念。中山先生的主義，既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同一性與發展性，那麼民權學說的發展，當亦有這樣的內容。

一般的抽象的平等，中山先生稱之為『假平等』。根據事實發展的平等，才為『真平等』中山先生曾畫兩個圖來表示其間的區別。

我們不能跳出我們的自己歷史的範圍，而懸空地企談高度民主，同樣地也不能不如中山先生所言：『中國革命，決定採取民權制度』，這種民權制度，誠如中山先生所言『祇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為中國建國既不能取消資產階級的法權任何一部，則建國民主祇有擴充民主的精神，不為資產階級的民主所限，要『駕乎歐美，而上』，要求建立更有內容的民主，同時準備為社會主義的民主而奮鬥。中山先生說：

革命的始意，就是打不平，到了平等以後便可了事。」（一〇三頁）中山先生亦說，『平等和我們的民權主義相同，因為民權主義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這和列甯所謂『民主就是形式上平等的意思』相同。

復次，中山先生對於浪漫的自由甚加非議，反對極端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這有兩個道理，第一，自由主義和『平等學說』不同，平等是有所謂『民權主義與社會主義相連帶』解決的可能，而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却是祇限於資產階級的民主方面的；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對立的。

我們的時代和十八世紀不同，若強調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沒有社會主義的進步觀點，則本身便局限於資產階級的範圍內，民權便成了不可超越的東西了。所以，中山先生說，自由遠不如『發財』這個口號來得切實，『三民主義可以包括發財，俄國革命之初，實行共產（按即戰時共產主義）是和發財相近的。』因為我們的革命任務，不僅發財，所以『不能用發財兩個字』（九六頁）。



中山先生既主張民主平權，當亦主張民主自由，即政治上的平等與政治上的自由，但却反對個人放蕩的小資產階級性的自由，無紀律性的浪漫散沙行爲，根據中國社會落後性而強調組織的集團嚴肅力量。這種始意，實在是對於中國傳統的「君子不黨」的放任思想，加以糾正，而對於言論自由集社自由則在憲政意義上是極其重視的。所以中山先生說：『自由的解釋，簡單言之，在一個團體中，能夠活動，來往自如，便是自由。』第二，中國是被壓迫的民族，首先要爭取的是民族解放。所謂民族自決權，據列甯所示，『純粹是政治上的獨立權，是政治上自由脫離壓迫的一種權利，具體講來，是一種政治民主的要求。』『全民族的任務，即民主的任務，推翻異民族壓迫的任務。』所以爭自由，首先從爭國家的自由起，『部分的利益要服從全部的利益』。民族解放，本身便是政治民主的要求，中山先生和列甯意見相同，他說，『我們的民族，可以說和他們的自由一樣，因爲實行民族主義，就是爲國家爭自由。……萬不可再用到個人身上，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完全自由。』第二講

一〇〇頁）又說，「中國現在是做十多個主人的奴隸，所以現在的國家，是不自由的，要把我們國家的自由恢復起來，就要集合自由成一個很堅固的團體，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國家成一個大堅固團體，非有革命的主義不成功。」（一〇一頁）在目前統一戰綫發展的過程中，答復日本軍閥的侵略，我們應如何根據他的遺教集合自由成一個很堅固的團體，用革命的方法，實行革命的主義呢！個人的利益自由，黨派的利益自由，階級的利益自由，皆應服從於爭取大團體的自由。這是中山先生以大團結爭大自由的民權理論，值得我人現在萬分注意的。

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自由，在中國是應當削弱的，反之，民主抗戰的民族自由是要爭取的，民主建國的政治自由是要尊重的。個人自由主義是和現實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的，不是和法西斯主義對立的。法西斯主義並非反個人自由主義，而是大資產階級的新個人自由主義，消滅大眾的政治自由，而遂行大資產階級少數的政治極端的自由，從金融寡頭到個人獨裁。中山先生批評俾士麥的政治爲『中央集權的獨裁政治』，

爲『反對民權的很大手段』，稱爲民權的『第三障礙』。法西斯的獨裁、以中山先生的民權論看來，不但是民權的障礙，而且是民權的死刑了。

法西斯的大資產階級少數的自由，是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大多數自由對立的。有人說二者皆沒有自由，那是形式論者的自由觀，要知道自由是有具體內容的，不是資產階級的絕對空虛的形式。中山先生便反對這種『形式的可能性』之自由，而主張『實質的可能性的』自由，所以在民權主義第二講中一再說，運用政治的團結力量，結成如士敏土如石頭，而爭取實質的自由。在目前民主抗戰的階段，更須了解中山先生的士敏土與石頭意義。

#### 四、中山先生民權論的進步性

一、中山先生認爲資產階級的民主，並『沒有充分的』民主，『人民仍然繼續爲民主而奮鬥』，所以中國的建國民主要求超出歐美的民主，而建立更善的更具備內容

的民主。因為資產階級的民主沒有「和社會主義相連帶的」解決，社會問題仍未解決，還有社會革命。中國的民主建國，要削弱資產階級法權神聖性，而具備下社會主義民主制的前途條件。所以他說：『法國美國現在還是革命，我們就全學到了法美，到了百十年之後，一定也是免不了再起革命的。』又說：『我們提倡改革，決不能夠學到了像現在的歐美，便算是止境……若是再起革命，豈不是現在的革命徒勞無功麼？』（第六講一五九頁）

二、民主是國家形態之一，在國家機器未消滅之前，民主政治的機器應當力求進步，使接近於社會主義的門戶，使民主成爲可超越的限界。所以中山先生批評歐美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機器不完全，主張應當採取新式的完美的民主政治的機器。中山先生認爲歐美民主政治的機器的主要缺點，在於人民不滿意於政府。這一點，我們可以說，資產階級的民主，本質上是所謂『富人的民主』，少數人的民主，大多數人民是被限制於狹隘的民主權利範圍內，自然不會滿意的。中山先生說：『政府過於專橫，人

民沒有方法來管理，不管人民是怎樣攻擊，怎樣頌揚，政府總是不理。現在世界上的政治不進步，民權思想很發達，無論那一國人民對於政治機器的現狀，總是不合他們心理上的用法。（第二講一五八頁）因此，中山先生主張中國要『造成一個民治的國家』，『民權思想儘管是從歐美輸入的』，而民權制度却要求比歐美進一步，適合大多數人的要求。這樣他便研究出『權』與『能』分別的民主制度，因而有『政權』與『治權』的區分。他主張用這種新式的民主制度，使政府與人民統一，政府建立在人民的利益上面。而比歐美『不徹底』（一六〇頁）的民權，更進一步，超出『人民和政府日日衝突』的民主，超出『民權新力量，政府舊機器』的民主，建立民權新力量與政府新機器的民主。在這裏，我們要了解所謂新力量是大衆，舊機器是資產階級的政權形式，中國建國的民主，無疑地照中山先生主張講來，是適應大衆新力量的新方式。而現在法西斯主義的『專橫』（見上字句）中山先生見之，恐作三日嘔！

三、中山先生權能分別的民權學說，曾引阿斗與諸葛亮的比喻來說明。如果我們

不惡意地曲解，應當從政黨政治方面去了解。我們知道前進的政黨都是政治覺醒的分子，是全民的甚至階級的少數，而大多數政治不覺醒的羣衆，是應該由政黨少數領導的；執行時代的革命任務，不是跟羣衆的尾巴主義前進，而是由真確的政綱而領導羣衆，使羣衆——階級——政黨——領袖的關係成爲直立的金字塔。在這裏，我們認爲中山先生所謂阿斗的比喻是指有民主利益的無政治覺醒的大衆，而所謂諸葛亮的比喻是指政治覺醒的政黨或偉大的領袖。革命的政黨以及指導政黨行動的偉大的領袖，基於大衆的要求而行使「治權」，而被與以廣大民主權利的大衆行使積極的「政權」。中山先生根據這一理論的民主，使人民大衆的利益主張不和政府相衝突，避免資產階級的狹隘的民主流弊，可能向着社會主義的民主前途發展。這是我們應當在建國的具體方案中來充實這一原則的。因爲據列寧亦說，前者澈底時，便到後者的門戶。

末了，我們可以引中山先生的關於這一原則的話如下：

「政府的威力可以發展，人民的權力也可以擴充，有了這種政權與治權，才可以造成萬能的政府，爲人民

謀幸福，……中國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個新世界。」

中山先生的志願，進步的民權學說，是要使中國在地球上造成一個新世界！

# 抗戰建國中民族問題的民主號召

## ——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之聯繫問題

### 一、民族解放與民主之不可分離性

「聯代大會宣言謂：『非抗戰則民族之生存獨立且不可保，自無以遂建國大業之進行，而非建國則自力不能充實，將何以捍禦外侮，以求得最後之勝利。』」

又謂：『政治之自由，為吾民族生存之保障；經濟之自由，為吾民族生存之憑藉，惟能合吾族之力以共保之，乃能合吾民族之力以共享之。』

又謂：『民力的發展與民權增進，相為因果。』一直到現在還有人把民主問題與民族解放戰爭的民族問題，分離開來作為孤立的東西看待，這一無識，比前一年所談論的『抗日第一或民主第一』的形式爭辯，更加劣勢。



我們知道民族解放戰爭是民族自決的最高鬥爭，所謂民族自決權「純粹是政治上的獨立權，是政治上自由脫離壓迫的一種權利。具體說，是一種政治民主的要求。」在被壓迫民族中，「客觀上還有全民族的任務，即是民主的任務，推翻異民族壓迫的任務。」

所以，我們說，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是民主的民族解放運動，因而民族解放戰爭，不但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而且是民主運動的一個側面。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便是要求民族平權的政治上的民主權利。

弱小民族的民主運動，本身有兩個民主的側面，即對於要求的民族獨立權的政治上的民主，以及對內要求的少數民族平權的與公民平等的民主。

所謂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是指在抗日過程中對內民主主要以爭取對外民主為準則，對內民主主要以不妨害爭取對外民主為界限；尤其在對內經濟上的民主，要以不妨害爭取對外政治上民主為界限，如果挑撥階級內亂，便違背了這一原則。限於

在這點而言，這一民主側面服從於彼一民主側面，所以說對內民主，要服從對外民主，『抗戰民主』形成『民主抗戰』（對外要求民族的民主）的一個手段性的東西。這不是把民族問題降低，而反是把民族問題提高，而是爲了達到總的民主的要求，在抗戰過程中，把民主的內容更具體化罷了。

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本身便是一種民主的形式，抗戰過程中主要的有力的民主形式，對外要求民主之革命戰鬥性的民主形式，沒有這一對內的低級的民主，便爭取不到對外要求民主的勝利，即爭取不到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同樣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鞏固與擴大，倒不是別的任務，主要是充實並加強這一民主形式，使民主形式高度化，逐漸擴大民主的範圍。

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還是一種革命的機構，以答覆法西斯日寇侵略的革命方式，牠不是策略，而是政治路綫。忽略了革命機構的意義，便要把統一戰綫了解而爲資產階級國家反民主的政黨聯合（如國民聯合內閣）。因爲，民族解放戰爭所以是革命的

，在根據內部的民主形式的充實，而達到爭取外部民族獨立權的政治民主的解放。所以我們的革命的號召，是內外民主的，沒有內的民主根據，達不到外的民主目的，反之經過外的民主勝利，使內的民主始能健全建立。二者，一方面是相為因果的，他方面是一個問題的二個側面。

有些人把民族解放認為和民主是兩件事，這是不了解民族獨立權的要求本身便是民主問題之一，同時亦不知道民主就是平權的意思，以及內的平權和外的平權之不可分離性。如果，把民族解放和民主分離獨立起來，那不是取消革命的意義，便是歪曲民族解放的歷史性質。

「在被壓迫民族解放問題中，不應該限於消極的目標，單是驅帝國主義為難作對。假如在殖民地的問題中，革命的黨僅限於此，那麼牠是欺騙了民衆。另外還應該有一個積極的目標，就是這些民衆的深切的利益。……民族意識的發達，乃是民族進化中的一個進步的階段，問題是在於怎樣以一種長期的實際的合作，驅解被外力所壓迫的人羣所由以構成的種種地理上、人種上、精神上、……的條件，然後對於這些要素，供給一個組織

的方式（國家），這樣一來，這個民族就變成他自己的自然力量，物質力量，精神力量的主人翁，並且知道爲了自己的利益去利用牠們，使其從前壓迫着的社會加速地進化。民族的形成，表示着歷史的前進一步，表示人類向着世界大同的發展中的主要的一階段。」（巴比塞述語）

所以民主的抗戰與民主的建國，實在是一個問題，表示着歷史進化的步驟問題。這不是一個抽象的形式問題，而是有具體的內容的。在帝國主義的本國削弱民族主義的基礎是歷史的進化，這是民主的要求，在殖民地弱小民族削弱其反民族主義的基礎同樣是歷史的進化，這亦是民主的要求。

世界的民主主義，到了中國，便可以成爲民族主義，中國的民族主義到了法西斯日本帝國便成了一種反動的反民主主義的法西斯主義（大和魂）。

所謂『非建國則自力不能充實』，這是民族解放的所謂積極目標，供給一個方式——民主的國家。沒有這個自力更生的作用，民族解放是空虛的民主之感性的號召。民族解放是政治民主要求之一，大會宣言所謂『經濟的自由』，是政治民主的一

個要素，是隸屬於政治民主之下的一個節目，而不能了解為狹義的經濟要求。

## 二、保障和平，即爭取世界民主

抗戰建國綱領謂：「本獨立自主之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為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對國際和平機構及保障國際和平之公約，盡力維護，並充實其權威。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勢力，制止日本侵略。」

宣言謂：「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一部分之利害即全體之利害，故每一國家謀世界之安全，即所以謀自國之安全，不可不相與戮力，以致力與保障和平，裁制侵略。」

有些人到現在還懷疑和平運動是和資本主義講求妥協，或把和平了解而為抽象的絕對的東西，而不知道爭取和平是全世界革命爭取民主的意義。民主國家的反侵略反戰爭與弱小民族國家的抗戰，在目前反法西斯戰爭並爭取民主的現階段中，具有革命的一致性，因而對於侵略者的制裁，必然以保障和平為原則的號召。

「社會主義的革命，不是一次的動作，不是在一條戰線上的一戰，而是在各種的階級衝突底整個時代，在一切戰線上，即在政治經濟的一切問題上的很多的爭鬥……若以為爭取民主制的鬥爭，會使社會主義革命或者蒙蔽，那是根本錯誤的，反之，若不為民主制作普遍的鬥爭，則不能準備自己去戰勝資產階級。」（伊里奇語）

所謂『在一切戰線上』，在目前便是說在弱小民族的統一戰線上，在資產階級國家的人民戰線上，爲了反法西斯戰爭而保障和平的各種鬥爭結合的意義。

資產階級國家的人民戰線，固然不是以爭取狹隘的民主爲界限，然而在目前如果放棄保障部分的民主制之鬥爭，而待法西斯完成反革命的任務時，始爭取全般的民主制，那是自殺。這是在革命巨人的教訓中已經成爲鐵的準則。

同樣的，我們不能以現有的和平機構爲滿足，然而在目前放棄已成爲和平保障或對於法西斯束縛的和平保障之鬥爭，而在法西斯強盜進行世界屠殺將一切和平機構否定時，始起而向法西斯革命，那亦是自殺。

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對於世界的保障和平的任務，是爭取世界民主問題中的一

環或一節，因為：

「民主之各部分的要求，如民族的自決亦在其中，不是一個孤立的絕對的，而是全世界民主運動（現在的  
一般社會主義的運動）之一部分。」（同上）

所以，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必然形成全世界民主運動的一個具體鬥爭，中國民族問題的解決，形成全世界民主運動的一個縮圖，同時亦是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節目。在這裏我們須了解以下的二個意義：

一、保障世界和平是民主的運動，中國為和平而進行的民主運動即民族解放戰爭，是全世界廣泛的民主鬥爭之一部；

二、反法西斯侵略是鬥爭，不是抽象的和平，中國的抗戰和全世界反侵略的力量之結合，便是「為民主制作普遍的鬥爭」之現階段的重要任務。

民族解放是民主的運動，是被壓迫民族爭取真正平等的問題，因而「民族問題從局部的、國家以內的問題，轉為共同的國際的問題，轉為被壓迫國家與殖民地從帝國

主義束縛中解放的問題。」（同上）

希特拉御用的奧國國社黨日耳曼人的民族自決，御用的捷克蘇台德黨日耳曼人的民族自決，那不是民主的運動，反之正是法西斯對於世界兼併的問題，這沒有把民族問題和緩，反以民族問題從種族的仇視的空氣中混亂起來，尖銳化起來。這正所謂『民族解放鬥爭在某種情形之下，會被其他另一個大國所利用，以遂其同樣帝國主義的目的。』『馬克斯在過去世紀之四十年代主張贊助波蘭人與匈牙利人之民族運動，而反對南斯拉夫人與捷克人之民族運動，因為當時南斯拉夫與捷克是反動的民族，為俄國專制主義的前鋒，而波蘭與匈牙利為革命的民族。』同樣的，在目前，我們反對奧地利與捷克的日耳曼人的所謂民族運動，因為他們是納粹第三帝國兼併世界的前鋒。所以，民族解放運動，是以民主運動與反法西斯侵略運動為準繩，而不是一個一般的純粹的空虛概念。

我們之所謂世界和平之不可分割性，同樣是以民主的要求為前提條件，如果犧牲



民族獨立，即政治民主的自由，而苟安於一時的妥協，結果擴大戰爭的性質，那不是和平的保障，而是和平的否定，縱容侵略者的反動。例如，英意談判，不管英國『均衡勢』的企圖是否幻想（參看本書第五章），不管這種犧牲阿比西尼亞獨立與西班牙民主制是否可以和緩歐洲戰爭，是否可以減輕英國自身和法西斯的直接矛盾，而本身性質則是反動的，反民主之帝國主義的陰謀，與保障和平的意義適相對立。英國在這裏，祇有在加緊軍事擴充的積極準備中，始敢講所謂『現實主義』（一）和平女神不是在大炮炸彈的火藥味中發抖麼？

『我們估量各個民族運動的價值，自然應以其對於革命運動之利益為標準，而不是形式上用抽象的觀點去觀察他們。自然，多數民族運動，各有各的特殊的相對的革命性，也就如有些民族運動含有自己的特殊的反動趨向一樣。』阿比西尼亞雖然還是君主式的，而對於帝國主義法西斯的戰爭，却是民主的運動，反之奧大利與捷克的日耳曼民族儘管是開明式的，而甘心做納粹第三帝國侵略的先鋒，卻是反民主的戰爭

陰謀。英國紳士張伯倫否認阿比西尼亞的獨立，而勸告捷克政府給與蘇台德黨以充分的自治，正是倒置了問題的中心，這顯然地給與世界和平以一大障礙。我們綱領中的和平外交，是以全世界民主運動的利益為標準，我們要立在全世界民主運動的我們自己的崗位上堅決地反對這種反和平的傾向！

所以，我們在做保障世界和平爭取民主的運動中，特別要小心資產階級的虛詐性，因為『資產階級民主，依照其本性，對於一切平等問題，懷抱着抽象形式的態度，對於民族的平等亦是如此。在人類個性平等一標語下，資產階級民主聲言無產階級與私有財產者，被壓迫者與壓迫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暗地則欺騙被壓迫者。平等思想，乃是商品生產關係之反映。』我們被壓迫民族的平等要求，是資產階級民主的產物，同時復應把這種民主的虛詐性揭發出來。對於阿比西尼亞『既成事實』的承認，便是這一虛詐性的反映，我們要反對這種承認，因為虛詐性可以在『偽滿』既成事實，華北既成事實，同樣作不利於我國的顯形活動，本質上反民主要求的活動。在保障和平

制裁侵略的世界運動中，我們要以「歷史的具體的尤其以經濟的情勢爲觀點」（全上）

「比里尼斯山的這邊的真理，到了那邊就變成錯誤。」（巴斯加名言）中國最落後的封建剩餘之民族意識的否定，是漢奸；日本最進步的民主主義者如鹿地亘以及多數反對大和民族魂的人士，却是革命者。贊助希特拉的日耳曼民族主義的，是危害世界和平，打擊世界民主運動；贊助中國與西班牙的民族主義的，却是保障世界和平，爭取世界民主。這就是歷史的具體性。世界和平之不可分割，要在這種意義方面了解。

### 三、對內民族問題之民主解決

大會宣言謂：「中國境內各民族，以歷史的演進，本已融合而成爲整個的國族，且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已對於少數民族豫爲之諾言矣。」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

國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惟根據於自由意志之統一與聯合，乃為真正之統一與聯合。」

中國諸少數民族在自由意志之統一與聯合之民主精神上，和漢民族成立共同的共和國。這是中國民族問題中之對內民主的性質。

日本帝國主義曾利用了中國民族間的距離障礙，也提倡中國各民族的自治，大衆自治，或大同自治，以企圖作其附庸，猶之乎希特拉爲了併奧侵捷，高唱奧捷二國日耳曼的自治一般，這不是民主的號召，而是陰謀。要知道大民族的民族自治是『自由分立』，而小民族的民族自治則是『自由聯合』，這不是矛盾，而是矛盾的一致性，以民主利益爲基礎之一致性。

「小民族中的社會主義者，應當反對小民族的閉關主義，孤立主義，特殊主義，應當爲全部的和共同的打算，應當主張部分的利益，並顧從全部的利益。或者有些人們，毫不對問題想一想，而以爲大民族中的社會主義者主張『自由分立』，對小民族中的社會主義者主張『自由聯合』，這是一種矛盾，但是達到國際主義和民

族聯合，除了以上所說的，沒有別的路可走。」

在抗戰過程中，我們要建立相當的民主機關，儘量容納諸少數民族的參政地位，例如參政會應盡可能地使少數民族的代表參與，根據民族間的民主號召，打擊日寇的陰謀離間，亦祇有根據民主的方式速求各民族的團結，始能克服敵人的民族分化政策。

民族團結與各黨各派團結，以及各階層團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同樣都是民主的形式，平等的號召。民族團結的發展，亦是隨民主之逐漸擴大，而鞏固起來。

復次，所謂『統一的』，是傾向於民主集中制的意義，所謂『自由聯合的』是傾向於民主平權的意義。有些人看見『聯合』二字，會懷疑為個別地方封建特權之存在承認，然而也容許有些人看見『統一』二字就會懷疑而為『官僚主義的國家集中制』。其實宣言上已經把統一與聯合規定為不相背離的含義，一再提及『自由統一的即各民族自由聯合的』文義。

我們要在內容上注意民主的機構，不是在字面上注意一般的形式。祇要有各個單獨區域民族問題存在，民族問題沒有解決，即聯邦共和國亦是一個『進步』。因為在歷史上『聯邦共和國是由君主制過到集中的共和國的一個過渡，條件之一就是民族問題。』（全上）

然而所謂『自由聯合的』，不是一定死鑲入聯邦共和國的形式中，主要視民族問題的具體實況。即使民族問題嚴重發展起來，『也要為實現統一的集中的民主共和國而作最堅決的鬥爭。』（恩格思語）

這裏所謂『集中主義，絕不是要把廣大的地方自治除外，在各個區域堅持國家統一的行情形之下，這種地方自治要無條件地把一切官僚主義和一切自上而下的命令主義都廢除。』（全上）

綱領與宣言，對於地方自治與憲政基礎問題，都有明確的說明。這可以補充民族自由統一的國家建設問題。我們如果充分地實行地方自治，就可以和緩了民族間的障

礙，那麼將來建國的途徑，便不是聯邦的共和國形式，而被代替以集中的共和國的形式。我們要注意民主的廣泛的內容，廢除官僚主義與命令主義，建立普選制度，民選地方官吏制度，而不要死板板地注意統一與聯合的名詞。

一方面『自由聯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我民族的『分立』，根據民族的自由的統一戰線反抗日寇的侵略，這是『合吾民族以共保之』對外民主的號召，他方面『自由聯合』，復是建國中對於各民族的共負大業的前提，這是『合吾族以共享之』對內民主的號召。

我們在抗戰建國途中，如果把民族問題這樣民主式地對世界，對侵略者，對國內各民族，堅決地執行起來，那麼，這真的是實現了『落後的歐洲，而進步的亞洲』之教訓了。

# 關於抗戰建國綱領中的經濟建設問題

## 一、我們的經濟條件

抗戰建國綱領中關於經濟問題的規定，包括了資本的發行，農工業的生產，交通的建設，商業貿易的統制，財政金融的鞏固與改進，人民生計的改善，此種繁重的計劃，在這一龐大的建設範圍中，每一個問題都是國民經濟部門的專門問題。我們爲了實現綱領規定的原則，需要全國人士集中精力研究牠的實施方案與具體價值，尤需要確認牠在抗戰建國過程中的歷史意義。

我們知道我們自己的歷史，第一，中國本身是一個落後的封建殘餘作梗的半殖民地經濟，一方面苦於資本的發展，他方面猶苦於資本發展的不足，爲『活的東西所苦同時復爲死的東西所苦』。第二，中國目前超過了本身的經濟危機嚴重階段，即受



帝國主義束縛的經濟破產階段，已經躍入那根據破產中的家產與日寇拚命的民族解放戰爭階段。這一階段並不是如資產階級國家的『戰時經濟』範疇——以破壞資產階級神聖的法權而掙扎資本主義的存在，以否定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而維持資本主義的萎廢寄生性質。在最近我們可動員的人力物力，因了土地的陷落，物資的侵佔，資本的淪陷（據云在上海卽有二十一萬萬元）與預逃（據云在外國銀行存款有二十餘萬萬元），勞動羣衆的戰時游離與戰爭參與，貿易與市場的緊縮與失陷，無疑地喪失了廣大的源泉，這是我們自己的經濟問題的嚴重困難，不能忽視的苦境。

反之，我們亦不能不在我們自己的經濟條件中檢討出我們的優勢，第一，我們沒有資本主義的經濟條件，却也不受資本主義經濟沒落過程中的法則支配，自然這所謂不受支配者，不是說不受國際資本主義的環境支配，而是說不受資本主義國內條件發展的支配。侵略國因了自己社會的經濟機構而冒險侵略放火，苦於侵略而自掘墳墓；被侵略國因了自己的社會經濟機構而遭塗炭，苦於被侵略而求自己解放，侵略者以擴

大民族的矛盾而企圖和緩其經濟機構的矛盾，被侵略者則根據經濟結構的統一而爭取民族的獨立。第二，所謂『動員』是資本主義的反常法則，本身已經毀壞了資產階級的財產權神聖性與勞動權神聖性，在十八世紀時代，這二種神聖性充滿了整個歐洲社會。每個人類的心靈，而資產階級的學者都把這種神聖性在自由平等的形式概念上絕對地學術化起來。所以，資產階級國家之所謂『國防經濟』，所謂『戰時經濟』，所謂『準戰時非常體系』，包括着否定資本主義發展的危機以及由這種否定而促進的社會主義否定資本主義經濟的革命。因此，尤其在資本主義沒落階段的法西斯國家，『動員』是反民主的，統殺民主的產物，『動員』祇爲了軍火大王而犧牲一切。我們的經濟，天然沒有資本主義國家『戰時經濟』的積極的破壞力量與消極的矛盾形態，但我們的國防經濟却是一種新生的性質，不是如侵略者沒落的性質。我們經濟的消耗力量遠不及侵略者的偉大，然而我們沒有『資本循環』的偉力，却也不受『資本循環』法則戰時停頓的危機。我們的經濟動員沒有破壞了資本主義的有價遺產，却因了民主的發展把舊的

社會頑石粉碎了。我們雖然不能孤立地超出資本主義新經濟恐慌之外，却因了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受資本主義新經濟恐慌的束縛較敵人爲輕。我們的市場是被破壞了，但這對於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尤其對於敵人在華的貿易，也受嚴重的打擊，反之在戰爭過程中我們可以開闢新的國內自給自足市場。『帝國主義在財政上及經濟上對華的統治』，因了反法西斯戰爭，起了程度上的變化。

## 二、經濟建設綱領的革命價值

綱領中經濟建設的諸問題是一般性的原則，首先我們黨對原則具備着經濟改革的具體認識。因爲按照經濟問題的各项規定，敵人亦有類似的『戰時經濟』或『國防經濟』與『統制經濟』等等計劃，敵人的總動員法案在形式上亦不出我們綱領中的幾項計劃，在某種程度中，敵人所利用的產業組織比我們的條件更有國防經濟的價值。那麼我們在何種意義的建設上便比敵人的國防經濟更進步，更有效，更成爲歷史發展的

動力。

我們的反侵略戰爭，是革命的戰爭之一，因而經濟建設亦是以革命的方法為基礎。在民族革命的過程中，經濟建設多含手段性的消極意義，一切都以國防的價值為前提條件，到了最後勝利的建國過程中始有積極性的新中國經濟計劃的環境。我們固然不能孤立地把前後階段絕對地分離起來，可是至少我們應有畸輕畸重的分別認識。

第一，經濟問題的改革不是純技術性的方法所能達到目的，如果是這樣，把綱領的經濟建設規定，和日本議會所通過的總動員法案比較，它們祇有程度的不同。主要的是，綱領中的革命精神。我們不是機械的比例主義者，但一八六六年德國『由上而下的革命』却是最好的模範，然亦有條件的，那條件便是恩格思所謂『由下而上的改革來補充牠』，以消除所謂『官僚的集中主義』，根據中山先生的話講來，一八六六年德國的革命，一方面他的經濟政策使德國飛躍地發展起來（當時德敗於拿破崙），他方面則『以國家力量去替代人民實行國家社會主義，這是民權的障礙

。』（民權主義第四講一三〇頁）細研究我們綱領中的經濟規定，很帶有一八六六年德國經濟政策的革新味道，我們應根據歷史的發展價值，拿中山先生民權革命的精神來補充起來，使政治民主的改革與新的經濟政策，有機地配合起來。自然，我們比之一八六六年德國革命的環境條件更加困難，更具有新的內容，但是，從意義上講來，我們在更進步的前途發展方面，可以吸收了德國的革命，揚棄了德國的革命。現在，各種刊物上恆常提到『國家社會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以探討中國經濟建設的問題，却忽略着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的批判價值。這一批判價值，便是中山先生所謂『民權的障礙』，克服了這種障礙——官僚的集中主義，才能使經濟建設成爲進步的。

第二，我們要從經濟技術與『生產方法』統一地認識。綱領中的規定很採着資本主義的經濟技術的價值，這是無庸列舉的。我們在抗戰過程中確亦需要應用先進國家的技術來實行國防經濟的建設。然單純這樣是不夠的，我們更需要推進我們本身

的『生產方法』(Produktions Weise)。這一術語在中國流行很久，生產方式，生產樣式的譯語都傳達一樣的意義，最好譯做『生產指導法』，因為很多刊物上把這一術語誤用做『技術』的意義了。牠的具體意義是：某種生產手段與某種勞動力的結合關係。譬如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是獨占的生產手段與工資勞動者勞動力的結合關係，蘇聯的生產方法是公有的集中的生產手段與自覺的社會成員勞動力的結合關係。

經濟建設綱領對於生產手段的國家計劃化，一方面是強調國防的價值，他方面確亦是德國革命式的改進；對於改善人民生活的規定無疑地亦注意到直接生產者的勞動力之新社會要素方面，無論在抗戰經濟建設中或在建國經濟建設中，這一新社會要素的問題，都要超過俾士麥的社會政策。我們知道除了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直接生產者對於獨占的生產手段（不是決定意義的手工業生產手段除外）是對立的，不可融洽的。我們的歷史雖然不能在經濟建設中使直接生產者對於生產手段的對立消滅，而却可以用革命的方法使二者造成某種融洽、提高直接生產者的教育，喚醒他們的政治意

論，給與他們以民主參政的廣泛權利，便可以使直接生產者成爲社會成員自覺的勞動者。我們在抗戰過程中，由於這樣革命方法的應用，使國防經濟的生產手段可以不和勞動羣衆對立，相反地可以使廣大勞動羣衆都在政治覺醒條件之下愛惜並發展國防經濟的生產手段。我們在這一意義上，最高的理想要做到一切生產手段是民族危機克服過程中的一切人民的生命工具，因而生產手段的私有性在民族解放戰爭中，一方面保存着營利主義的原則，他方面則具備民族生存的共同財產性。我們把這種意義姑名之爲抗戰最理想的最好的生產方法。這種生產手段與勞動力的結合關係，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史中所特有的生產方法。祇有基於這種過渡的生產方法，始能把經濟建設的革命價值發揚出來。

建國的經濟建設，是抗戰的經濟建設的發展階段。我們祇要在抗戰過程中發揮了革命的生產方法的精神，那麼將來憲政運動中便有順利的前途執行中山先生偉大的建國計劃。建國的生產方法是更高級的生產方法，他雖然不能超過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

階段——即私有生產手段與工資勞動者的結合關係，却可能在全世界資本主義沒落的發展中具備着進步的條件。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兩大政策，都是針對着私有生產手段限制的進步的經濟政策，都是要求使直接生產者接近於生產手段的進步方法，我們應在具體計劃中使這進步的方法的革命實現出來。由此發展而為所謂「耕者有其田」的生產手段與勞動力的結合關係，便是社會主義前途的生產方法的轉變。

勞動者的自覺性是生產方法要素之一的革命價值，惟有使這一價值和生產手段的國民經濟建設計劃統一起來，才有建立新中國社會經濟機構的前途。這一意義，同時亦是和平建設新中國的物質條件。

### 三、技術革命的可能性

一切綱領都是使現在沒有的東西而計劃實現出來，所以一個革命導師說：『綱領與憲法之間有實質的差別。綱領是要說還沒有的東西，是要說應當在將來達到和爭取



的東西，憲法應當說，現在已經真正達到和爭取了的東西。」綱領的規定發展而爲憲法的規定是一個實踐的過程。

經濟技術的規定，同樣亦是我們現在還沒有東西，應當爭取的東西。爲了爭取技術的革命，生產方法的改進是必要的前提。我們知道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技術因其生產方法的寄生性質是絕沒有革命的飛躍了，例如在合理化過程中，牠祇改良了勞動過程，提高了勞動強度，而並沒有技術的革命。反之，在蘇聯因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的建立，則達到了異常偉大的技術革命，從『技術決定一切』到『幹部決定一切』（幹部駕馭新技術）的發展中，產生了斯太哈諾夫的技術革命，現在尚在發展中。我們所謂的一八六六年德國由上而下的革命，亦是基於資本主義新的生產方法的建立始能達到技術的改進。

我們在經濟建設中，要求爭取技術的革命，這是經濟建設中的偉大任務。在新中國的革命過程中，這一革命，不但有可能，而且是必然的。達不到經濟建設的這一任

務，中國革命便是憑空的懸想。然而，如果經濟建設仍建立於舊的社會的物質基礎上，即舊的生產方法上，則技術的改進是空想的。

我們『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這一口號，亦是革命的口號，而如何使既出的錢（資本）運用於國防工業的計劃中，變做新社會要素的生產手段，如何使要出的力（勞動力）發揮自覺性的戰鬥精神與生產技能，變做新社會要素的勞動力。進而使二者結成新的統一，就成了我們經濟綱領中的基本任務。這種意義下的經濟計劃，不但和敵人的總動員相類似，而且正和其矛盾的形態相反，這樣我們才是革命的，敵人才是反革命的。

在政治意義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全民族的大團結以答覆日寇的侵略，在經濟意義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新社會要素的生產手段與新社會要素的勞動力之融洽的結合或統一。爲了實行對敵人的消耗戰，建立我們的『新經濟政策』，是必要的條件。而要記住的是：技術的革命是和生產方法的改進配合着的，甚至是依賴於生產方法

的改進的。

# 目前歐洲形勢的認識及我們的外交政策

## 一、歐洲的新『均勢』建立起來麼？

最近國內文壇上對於國際形勢演變的分析，常犯了機械論與形式主義的嚴重錯誤，因而發生了對我國外交路線之不正確的估計。例如，對於帝國主義的『均勢』運動不了解，尤其對於『均勢』運動之現階段性及其具體價值之不了解，對於某些『協調』運動的現象之矛盾姿態方面之不了解，常常見諸分析國際關係的長短論文裏。

首先，我們要明白什麼叫做『均勢』？簡單地講來，『均勢』便是帝國主義間矛盾的一種姿態。均勢不但不能使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解消；反而是矛盾的培植與擴大。例如，英國大戰以後扶德抑法的均勢政策，不但沒有把大陸的矛盾解決，反而使其擴大形成目前的大戰的狀況，華盛頓會議的太平洋均勢運動，不但並沒有把中國問題解

決，反而使帝國主義在華矛盾擴大，以至形成日本帝國主義『九一八』以來的侵略。然而，這些均勢却在客觀上都存在過的。

其次，我們要明白張伯倫的外交政策是不是建立起歐洲的所謂『新均勢』呢？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造成『均勢』的條件，不是天秤上量的增減使成平衡的問題，而是資本主義發展機構中有否『突變性的規律』問題。如果把帝國主義間的均勢，看做機械的量的增減水平，那麼，法西斯國家加上些殖民地新肉，便成了均勢了，然而問題却不是這樣的機械的單純性，日本帝國主義加上東三省新肉，並沒有使得萊頓爵士的報告書成功，相反地產生了今日的大規模侵略戰爭。意大利帝國把阿比西尼亞弄成『既成事實』，並沒有使地中海英意矛盾減少，反而產生了德意對於西班牙的侵略戰爭。希特拉併奧的既成事實，並沒有把天秤平衡，反而產生了舉世所注目的捷克火藥庫的爆炸性，戈林說得好，捷克爲西班牙戰爭出志願兵，試看不久，又誰對於捷克出志願兵呢！

爲了使問題便於理解起見，我們不妨引一段名文在這裏：

「伊里奇發現了資本主義國家底經濟及政治的發展之不平衡性及突變性的規律。這規律就是說，各國的企業 託辣斯，及各種工業部門之發展是不平衡的，不按先後的秩序的，不是某一個託辣斯，某一個工業部門，或者某一國家總是走到前面，而其餘的託辣斯或國家跟在後面，而是突變的，某一國家發展中斷，而別一國家發展突進。同時正趨於落後的國家努力去保持其舊有的地位，這「完全是合法的」；但同樣亦是「合法的」，那正在跳進的國家努力去獲得新的地位。因此，遂至於使帝國主義國家軍事上的衝突成爲不可避免的。這事實已經發生過去了。例如德國在半世紀前，和英法比較起來，還算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同樣地關於日本也應說是遠遜於俄國的。然而到二十世紀初，德國和日本竟飛躍得很遠。……大家知道，不久以前的帝國主義大戰，是由這些矛盾中發生出來的。」

第一，我們知道世界資本主義自去年發生了新的經濟恐慌，已經由美國蔓延至全

世界，這其中最顯明的不平衡發展是：一般的輕工業部門託辣斯停頓，而以軍火業為中心的重工業部門託辣斯飛躍地發展，民主國家工業發展的緩慢，而以戰爭為營業的法西斯國家的軍事工業突飛猛進。這已經形成二次大戰前夜「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發展之不平衡性及突變性的規律」。

第二，正趨於衰微的國家保持其舊的地位是「完全合法的」，而跳進的國家努力去獲得新地位，亦是「合法的」。這便是一方面所謂「吃飽的」帝國主義，他方面所謂「未吃飽的」帝國主義，二者間「突變性規律」的「合法」鬥爭，不是一種量的不平衡的機械局勢。

第三，「資本主義已經發展轉變而為「先進」國家少數人對於地球上大多數人底殖民地化的壓迫和財政上的窒息之全世界的系統了」。然而這也不是大戰以前局勢的再版，這裏的「先進」二字，應該是目前的「法西斯瘋狂」，問題更加深刻而暴烈的了。

第四，世界資本主義正常的發展，被『突變性』的發展所代替了，因而在前者帝國主義間的『均勢』可以形成帝國主義間矛盾的姿態，和緩矛盾而擴大矛盾的姿態，如同在大戰以後資本主義相對的安定過程時代所見的各种均勢運動，例如道威斯計劃等等；可是在後者帝國主義的均勢條件却被法西斯魔王的所謂『大亞細亞主義』，『大日耳曼帝國』，『新羅馬帝國』轟成夢想。

在希特拉併奧的時候，作者有這樣的幾句話：『不是偶然的：當墨梭里尼併阿的時候，正在大英帝國扶德抑法，幻想歐洲「均勢」，以致當時的法國（還未成立人民陣線內閣）助意抗英；當日寇軍閥七七武力侵略中國的時候，正在大英帝國進行英日倫敦協商，幻想太平洋的「均勢」，以致美國態度猶豫；當希特拉併奧的時候，以支持墨梭里尼積極侵西為條件而併奧的時候，正在大英帝國由外交轉變而進行英意談判，幻想歐洲迴光返照的新「均勢」，以致和平國家羣起自衛。』

英國在近幾年來，不但沒有因均勢運動的各种協商談判而和緩了帝國主義間的矛



盾，反而不論那一次法西斯國家的侵略戰爭，都是大英帝國的均勢運動做了接生婆的功用。在歐洲，英法尼翁協定反是威脅住侵略者的一時的烈焰，而和侵略者的談判却把奧大利犧牲了，把西班牙戰爭更尖銳化了。在遠東，英國一向所幻想的均勢運動，並沒有形成大不列顛華南日本華北的新協調，反而因日本帝國主義的冒險戰爭威脅了新加坡。

如果，因為承認意大利帝國而獲得歐洲的新均勢，那太把阿比西尼亞看做挽救資本主義戰爭的無價寶石了，這塊寶石嵌入意大利羅馬帝國的王冠上，就否定帝國主義發展的突變性規律，那麼塞拉西皇帝便天兵天將似的可以自傲自大了！

有人還幻想，英國在歐洲的均勢運動成功後，便可以專力對付遠東的利益了。是的，英國不但現在對付日本，七年來日在對付中，『九一八』事變萊頓曾發表了有名的報告書，那時候英國地中海並沒有利益損害，像現在的危機，然而因對付日本却承認了東三省的印度化，使得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遭受國際孤立的打擊。當法幣實行的

時候，李滋羅斯奔走於東京倫敦之間，協商英日在華的經濟協調，然不久便是百靈廟事件。一直到蘆溝橋事變的炮聲響時，日本使者還在倫敦協商所謂『新均勢』呢！近一年來日本的反英宣傳都是向墨梭里尼學習的戰術。目前正在一般人替張伯倫幻想的時候，英國專力對付遠東的第一炮，就是英日上海海關協定！這一對付，日本獲得了十個月侵略戰爭以來從未有國際利益。張伯倫究竟是想利用東亞均勢和緩歐洲局勢呢？還是利用歐洲均勢和緩東亞局勢呢？或是二者兼施而同時和緩世界戰爭局勢呢？我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那一方面都是戰爭本質的『假象的個體』。

## 二、張伯倫的幾個幻圖及一個現實作用

我們知道的戰前均勢與戰後的均勢，主要是在於國際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合法的經濟協定或政治協定，目前比利士總理齊蘭的計劃書便是一個合法的幻圖。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帝國主義的均勢從犧牲某些國家的獨立建立起來。我們了解奧大利，西班牙

，阿比西尼亞，以至於中國，已經處於再分割的世界狂潮中，我們沒有近視到盲目的程度，把分割理解而為均勢。例如戰前五國銀行團的均勢，是在於帝國主義間的經濟協調，戰後帝國主義在華均勢的新成立，是在於華府九國公約的保障中國獨立與完整，戰後歐洲的均勢是在於道威斯與楊格計劃的復興德國。現在『殖民地化的壓迫與財政上的窒息之全世界的系統』是戰爭的徵兆，犧牲十個弱小民族半殖民地或怎樣由英國施行對於意大利以財政上的收買，也沒有均勢的前途。

那麼，問題便是：由英國張伯倫的外交政策所進行的英意談判，間接促成的法意談判，奧大利之日耳曼第三帝國的『既成事實』的承認，以及企圖成立的『四強公約』，是什麼意思呢？是侵略陣線的否定抑是和平陣線的否定呢？因了張伯倫的保守政策使世界現勢變更了什麼？

第一個幻圖：英國本身想從地中海與中歐的對於意德直接矛盾中脫節出來，幻想着大戰前金磅外交的優越性。因為自己拿刀殺人，不如借刀殺人，這是過去金磅外交

傳統的利器。利器的條件存在於金磅左右着國際市場。然而，這種條件，因了戰後的金元優勢，法郎集團的形成，法西斯國家的猛進突變的發展，一方面，英國嚴重地在地中海在太平洋和法西斯國家矛盾着，他方面唐甯街的慢性萎縮支配不了世界的金融霸權。所以，想利用法西斯國家的財政貧乏的弱點，使法西斯血肉的戰果，由倫敦的資本購買而來，這祇反映出英國金融資本的所謂『城市心理』，而沒有和緩了法西斯的侵略陣線。

第二個幻圖：英國想使帝國主義間嚴重的矛盾蛻化出來，利用所謂『四強公約』暫時安定中歐，而企圖使國際的矛盾轉向一個面目，借防共的寶刀鼓勵希特拉向東發展，使烏克蘭和波羅的海的迷雲和緩了地中海和巴爾幹的殺氣。亦猶之乎在太平洋六年來對日的妥協退讓，使日本軍閥注意到海參威和貝加爾湖。然而六年來日本軍閥但不敢把『防共十字軍』的東亞憲兵的支票向英國兌現，反而南進到英國市場的腹心。這一證明的悲哀事實，使張伯倫的理想，復謀『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打擊西班牙

的民主運動，離開法蘇的互助協定，使集體的安全被代替而為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分割運動，犧牲弱小民族而鼓勵侵略者的新十字軍東征。然而捷克存亡，已經迫在眉睫，却不能不使得倫敦紳士煩悶。艾登下台後第一次講演便說，事已至此，生米成熟飯，精誠團結注意國防吧！

第三個幻圖：英國想拆散德意軸心，孤立納粹老希。一方面希特拉併奧固然震動了英國友人法國的上下空氣，使法蘇關係更有進步的結合可能；他方面日耳曼帝國的版圖已經和意大利新羅馬帝國的東歐前衛線接壤，使德意的矛盾發展起來。英國對此，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希特拉併奧的『既成事實』，在張伯倫企圖中，是盡量使向後一方面開展，而阻止其向前一方面進步。所以，英國一方面重申英法協定，以安法國之恐怖心理；他方面則拉攏法意談判，增進戰前德人對於意大利背盟的惡劣影響，然而，德意的這種矛盾並不是新的，目前不過把矛盾顯然呈露到表面罷了，同時因了侵略者向世界放火的協調，解決向西班牙侵略的困難，此種矛盾並沒有像墨梭里尼

向奧境練兵時代的尖銳程度。希特拉訪問羅馬的盛舉，一方面在兩個獨裁者握手的時候，一再提明東歐的勢力範圍，各懷戒懼，他方面則都感於『合法的』既成事實之放火功績，復滿意高唱二大帝國『保障世界和平秩序』之『同心協力』！因此，侵略者間的矛盾或者因英國的外交影響增進了一些點染，然而侵略者間的野心，却實際地因英國外交的幫助而更加肆無忌憚。

第四個幻圖：英國紳士張伯倫與其說是保障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不如說是保障資產階級的文明。法國人民陣線的發展，西班牙民主制度的發展，甚至德意法西斯內部的階級矛盾危機，經濟的貧乏，都是老紳士的煩悶。如果人民陣線的發展，危害着法西斯國家，同時即危害着資本主義的掠奪文明，以殖民地遍天下的大英帝國會不會觸類旁通？所以，老紳士出馬的又一種意義，在於以資本主義現階段的領導者自任，保障世界的『光榮』，不至於使後起的孩子們如希特拉墨梭里尼之輩把牠葬送。儘管『既成事實』如此其多，然而據日本軍閥講來，那是仿效先進國的英國，並沒有

和資本主義世界的文明相背謬。張伯倫先生自然對於「既成事實」覺得算不了什麼，問題絕沒有資本主義的「文明」深刻，這倒是很阿Q式的。

一個「現實」：第二次大戰的爆炸性之強大，使英國對於一九四〇年左右始完成的軍事計劃，刻不忘懷。就在希特拉併奧的次日，英國議會便把下年度英國空軍預算案共需的軍費一萬〇三百五十萬磅，草草通過。英國並不忘其國防前線在萊因河岸的歷史教義，同時更謹慎着戈林的空軍，此次英法協定的重新申明，首先却不能不把英法防空軍事的協商明白宣佈，因為倫敦的空襲警報仰賴大陸的法國通知。現在，擴充空軍已經成了英國軍部的第一日程，從五月十一日英王親自巡視英國的空軍站看來，問題是值得很大注意。據同月十五日倫敦路透社電云，在十四日英國議會曾大事討論擴充空軍計劃，而將對於空軍擴充不力之航空大臣選頓氏被迫辭職，此外英國訂購美機，在加拿大計劃製造飛機，備戰的熱狂，可以概見。自從日本關於造艦自由行動之後，英國造艦程序當無條約的束縛，去年英國海軍部設計建造五艘新的巨艦，同時今

年三月底宣佈另有五艘巨艦亦在建造中，最近更有新的決定，同時將通過補充預算，出資建造。

艾登最近的演講，充分表示戰爭的迫切，英國的國難。英工黨議員阿特里亦說：「英意協定，無補於和平，不過新戰爭前的單純操演而已」。張伯倫覺得在近二三年後的擴軍比什麼都緊要，所謂英意協定以至英德協定不過想趁緩和直接尖銳矛盾的空隙中，進行大規模的擴軍計劃罷了。這是歐洲的混亂，不是歐洲的均勢。

### 三、什麼陣線被拆散了呢？

要明白張伯倫外交能否拆散德意軸心以至侵略陣線，那就要先知道英意協定誰是主動的，以及這種協定的有效程度如何？

第一，我們知道意大利已經處於經濟困難萬分危急的時候。意國預算的虧欠，一九三〇——三一年度爲五萬萬〇四百萬里拉，一九三五——三六年度，已達二百二十



六萬萬八千六百萬里拉，一九三六——三七年度之所謂正常預算會預定爲二百三十四萬萬一千三百萬里拉，虧欠數當不比上年度爲少。侵阿耗費已達一百四十萬萬里拉。而直到現在阿人游擊戰爭的活躍，還使意大利無法消化這『既成事實』。意大利軍隊總數不下一百二十萬，其中十三萬人已運到西班牙的侵略戰爭中

意大利擴軍計劃，近兩年來十分積極；而軍事工業的基本原料則大部份需國外的輸入。每年需煤一千二百萬噸，本國則僅產一百萬噸，需油產品二百五十萬噸，本國則僅產二萬噸。意大利每年須輸入將近一千一百萬噸煤炭，二百五十萬噸油產品，四十萬噸鐵和六十萬噸廢鐵，此外尚須外貨錳銅鉛鋁橡皮棉花等等。所以意大利的貿易入超，幾使本國現金告盡，只在一九三七年的前十個月中就負債五十二萬四千二百萬里拉，意大利成了空無所有的法西斯。

到了本年初，墨梭里尼的金庫迫得他不能不找借錢的對象，一切反英宣傳都是爲了這一目的所展開的外交戰術，光桿總理的流氓味道畢竟吃透紳士總理的縉紳風度，

趨馮越使紳士屈服，於是二千五百萬磅的目的借款，向英提出。第一個條件便是首先停止反英宣傳。據云墨梭里尼，雖沒有達到這樣巨大的目的，此次商業借款亦有五百萬至一千萬的巨數。

意大利在地中海與英國的矛盾，困難並非僅英國嚴重，意大利恐更加困難。意大利每年輸入食品工業品不下兩千六百萬噸，其中百分之八十靠海道輸入，而主要的路線爲直布羅陀，蘇彝士運河與韃靼尼爾。意大利在這點，只是慣用虛張聲勢的手段，而掩蓋自己的弱點。

所以，張伯倫紳士和墨梭里尼流淚的協定，是俗語所謂「富不與窮鬥，窮不與急鬥」的光棍勝利的傑作而已。墨梭里尼費盡心血，要使張伯倫入網，不惜稅筆致書，表示誠意。目的祇在於挽救目前意大利的危機。主動者是張伯倫麼？

第二，英意協定雖然已於四月十六日簽字，但問題正多，條約不算有具體價值，如西班牙問題，阿比西尼亞問題，還是懸案。現在看到的是意大利借到巨款，英國暫

時感覺無線電台上反英宣傳少了幾分。

最重要的是在目前帝國主義『突變規律』發展的時候，條約義務失了他的神聖性。凡爾塞條約，華盛頓九國公約，海縮條約，現在如何？前車之鑑，一九三七年的英意君子協定，支持了幾日？我們覺得英國這次不惜否定一條約的神聖價值（國際聯盟對於阿比西尼亞的獨立），而企圖獲得另一條約的神聖價值，可以說是英國矛盾外交的具體價值。不但墨梭里尼、希特拉亦想和英國談判，訂定現階段無價值的條約，而取得侵略的實質價值。侵略者，既獲得『既成事實』的合法價值，又獲得擴軍計劃的『資本』價值，條約上規定白紙黑字，有什麼關係？目前法西斯的國際瘋狂的冒險，還理會在安定期間始有價值性的條約束縛力麼？

本屆國聯行政院會議，瑞士代表穆達感於介在意德兩大法西斯之間侵略的危險，要求保留中立地位，智利代表愛德華則痛斥盟約的失效，謂『近年盟約力量，大見減色，或則熟視無睹，或則加以破壞，或則延不予以執行。』（見日內瓦十一日哈瓦斯

電）條約義務在目前資本主義突變性規律發展環境之下，有沒有價值性，我們由當事人的談話中就曉得了。

在這裏，不但英意協定，即法意協定，英德協定，以至於『四強公約』，『五強公約』，都是所謂『戰爭前的單純操演』，決沒有條約的束縛力，所以，我們可以說英意協定的有效程度，實在微乎其微。反之，侵略者却將計就計，正歡迎這個假均勢運動，以至無價值性的條約，試看英意協定簽字後，日德兩國的滿意聲明就曉然於條約精神了。

據此，張伯倫外交，除了支持歐洲的反動而外，不但沒有使什麼侵略陣線拆散，反而給與了侵略陣線以莫大的幫助，使野心者爲所欲爲。

反之，張伯倫外交，亦沒有把和平陣線否定，不過因其資助了侵略陣線，使歐洲政局增加暗潮，雖然對於和平陣線是有損害性的，而和平陣線的力量却發展着。

最近歐洲沒有新均勢的前途，張伯倫亦沒有和緩了矛盾，更沒有變更了侵略者對

和平的威脅性。英國不久要在侵略者新進攻的時候，遭遇着國內開明人士的政變行爲吧？

#### 四、我們外交政策的號召原則

根據正確的國際現勢的認識，才能正確地運用我們的外交政策。從我們上面的分析看來，世界不但沒有新的均勢，反而正在要爆發大戰。對於侵略者的讓步，祇增進了侵略者的攻勢，並沒有使世界局面安定。

我們要知道，帝國主義的均勢，並不是對中國有利的，相反地過去帝國主義在華的協調，使中國形成幾十年的內戰史，使中國的社會危機增強，數年來英國外交政策在遠東 和日本進行的新均勢運動，不但沒有安定了中國市場，反而給與日本以得寸進尺的機會而加緊侵略。現在張伯倫的外交並沒有力量干涉遠東，即有意干涉，而干涉的前途恐怕也祇有六年來犧牲中國對日讓步的重演而已。我們祇有堅決地抗戰到底

，以運用外交的條件配合，不能苟存依賴之心，而蹈過去依賴國聯主義之失敗覆轍。

第一，我們的外交政策是基於和平的號召：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是保障世界和平打擊侵略戰爭的一部分，中國的和平任務是全世界和平任務的一公分。臨大會宣言在這點是非常正確的：『從中國立場而言，則為捍禦外侮，為國家民族爭獨立生存；在國際立場而言，則維持條約之森嚴，對於破壞條約甘為戎首者，予以堅決之抵抗。』所以中國為民族解放而爭取世界和平，應與全世界反侵略的和平國家與人民形成一個外交戰線。

第二，我們的外交政策是基於民主的號召：民族解放，是『一種政治民主的要求』，全民族的民主的任務。這與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保障民主的鬥爭，形成一個關連的世界問題。我們的民主的抗戰與全世界『為民主制作普遍的鬥爭』，在一切戰線上，相互配合着。所以民族獨立的爭取與反法西斯保障民主的鬥爭，是兩極相逢的世界革命。我們基於這個原則，同情於一切國家的獨立與一切國家的民主鬥爭，同時

亦要求世界和平國家對我們的獨立鬥爭給與物質精神的同情與贊助。

第三，我們的外交政策是基於反侵略的號召：在這點我們本身固然是正在抵抗侵略者日本軍閥的進攻，但同時對於別有侵略者當其進行危害某些國家獨立，而冒險侵略時，我們亦要站在正義上堅決反對一切暴力。我們聯合一切反侵略者的友人，而爭取世界的和平與進步，我們拿抗戰到底的精神，以作反侵略的模範。

# 青年對於抗戰建國的任務

## 一、青年的時代與時代的青年

現時代的青年具備着與老時代的青年不同的以下兩點精神內容：

一、老時代的青年在中國三十年的革命史中固然亦盡了時代的一部分任務，而因了時代的局限性，老時代的青年便自縛於自己的環境。如民元以前的青年自縛於資產階級意識的浮面；憲政的政治意識，使當時青年形式地感於自覺手段的武器對於封建的無力，不健全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戰勝不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傳統，結果多數青年落伍於民十以前的形式議會裏面。『五四』的青年的進步，在於浸潤於資產階級的全體自覺手段——個人自由主義，然而中國半殖民地社會條件的發展，使絕對的自覺手段促成青年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幻想。『五四』青年不知有多少在資本外衣而舊社會



內容之假象面前，形成新式的士大夫身分。大革命時代以後的青年，因了新新文化標準的形式與資產階級意識的內容這二者間之矛盾，因了中國社會的不平衡發展，不知有多少乍寒乍熱者，朝三暮四者。新新文化的小資產階級的國際化裝，常傳染於中國的一部分青年頭腦裏。

現在的青年的自覺手段，超越了資產階級自覺手段的局限性，接受了國際間在一九三〇年以後的高度文化水平，而自我的文化批判，雖然正在發展中，而科學精神的重視顯然在否定前一時期意識的矛盾，並且在青年運動的環境中，正在工作上克服本身先天性的缺點。

二、中國經過了近數十年來的革命運動，青年運動在實踐的革命過程中，學習了最寶貴的教訓。民元以前日本留學生式的貴族形式，「五四」文化城的自由浪漫形式，大革命以後由城市到鄉村的矛盾形式，在現在青年的實踐教訓中走向否定的發展階段。尤其在中國民族危機發展的七年歷史中，青年對於民族解放的實踐鬥爭，曾提供

出時代轉變的決定要素(如一二九)，因而青年運動的發展已經走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在克服本身階級的缺點上，在克服青年羣衆不平衡的缺點上，正在努力向前邁進。

中國青年的時代 具備了豐富的文化內容，進步的世界觀，發展的社會實踐經驗；時代對於青年之厚惠在老時代青年看來實在羨慕不置。然而，做一個時代的青年却在於把握時代的精神，解決時代賦於自己的課題。時代的必然發展有現實的內容，青年把握着現實 使必然的時代，造就成自由的時代。青年的時代與時代的青年的統一，便是個人與社會的統一。青年要了解：『不但要了解世界，而且要變革世界』。在目前，中國青年主要的任務，不但要了解中國民族解放的現實發展，而且要變革中國國際的地位，使成爲獨立自由的共和國。

## 二、青年目前的主要任務

時代給與了青年以高度的文化意識與進步的實踐經驗，然而同時亦對於青年無情

地提出更艱巨的課題，讓中國每一個青年拿自己的血肉和精神來寫作，光大青年時代。所以，青年一方面承繼着過去文化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寶貴食糧與財產；他方面繼承人的任務却在於繼往開來，發揮更大的努力，把繼承財產保衛起來，乘積起來，備下一時代的青年享受與發揚。

現在青年的任務不比老時代的任務爲輕，反之，所有待解決的中國歷史傳統的革命工作，都交到青年的開花的心頭上了。

一、武裝自己的頭腦，堅定人生的新世界觀，已經形成青年自修修人的本分任務。沒有革命的理論，即沒有革命的正確行動。雖然青年的樂園被日本軍閥的飛機大砲轟成瓦礫，可是青年在活的教育中，在戰場中，更會學習着活的教育知識。如果青年了解了戰爭的理論，便是把社會科學的發展法則的具體價值滲入意識中了。青年在和中國社會實際接觸的條件下，和敵人奮鬥的環境中，青年的意識的進步會和生活的進步結合起來。所以，不利的學習條件之中，反有更有利的學習條件。尤其是文化青年

，求真理的態度，要超過生活中的一切要求。我們不是阿Q，但我們覺得有信心，敵人總要跪在「真理」面前。最近「綱領」上已經有關於科學的文化教育規定，青年應本此奮鬥。

二、克服中國社會不平衡的社會條件，首先要克服青年運動的城市與鄉村的不平衡，這是目前青年的一個嚴重任務。青年的政治警覺性非常敏感，尤其是中國文化青年，政治的覺醒更加尖銳，然而文化青年的小資產階級的個人利害關係之敏銳感，亦特別發達。青年個人與時代社會的統一，應當在克服工作上盡最大的努力。所以，克服不平衡的缺點，一方面是增厚青年抗戰建國的偉大力量，他方面是文化青年在教育與喚起落後工農青年的工作中，復由工農青年而教育文化青年，影響文化青年。這一任務的成就，可以否定了過去青年的「朝三暮四」的動搖缺憾，使勇往直前向建國的路上邁進。

三、統一青年運動，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已經由中央提出有價值的原則，青年

在抗戰建國路徑上首先要實現這一綱領的規定，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上，一再喚起國人要結成士敏土或石頭，青年的團結運動應先做模範的行動。

『宣言』中說過，抗戰最後勝利不但依據兵力，更依賴民力，而民力與民權則相為因果。所以，青年運動的統一既是團結民力的一部分，使成為青年的士敏土式的力量，則統一的方式應是依民主的精神為前題。我們知道結合的力量常大於被結合的分子，結合的力量不是如  $3+2=5$ ，而是  $3+2\sqrt{5}$ ，因為結合的關係中已經有分子以上的東西，那其中的『關係』便是民主。如果缺乏了『關係』，便成為形式的統一，所謂貌合神離者便是。

在目前，青年統一運動的規定已經宣佈，可是兩個月來的實踐工作還沒有使綱領具體化，我們要檢點，要努力，要促其實現。

四、不幸的很，青年遭遇了日本軍閥的侵略時代，全中國的青年男女已經處在暴風雨的大海中。困難的環境，使青年運動的工作更加困難。林伯渠先生在青年戰線第

五期上告青年的文章中，特別注意這一點青年工作的艱苦性，同時指示青年以克服艱苦的信心。我們忍痛耐心地工作，說服虛心地工作，排難解紛地工作，服從大衆地工作，並且要在工作中教育自己，復推進工作。我們在歷史上是有前例的代價的，那便是蘇聯革命青年在革命過程中在建國過程中的艱苦奮鬥，換得今日物質文化高度的享受。我們更要知道，我們的政府現在領導青年抗戰建國，領導青年革命，領導青年反法西斯戰爭，我們的精神是不痛苦的，我們比之世界上法西斯國家的青年在黑暗地獄中過生活，我們還是自傲的。我們不利的條件同時還是配合着我們的有利的條件。

光明之燈在前面，青年爲抗戰建國而努力吧。

### 三、文化青年的文化工作

第一，青年在救亡工作中，心常常是熱烈的，無所顧慮的，但熱烈的血肉的背面，還應具備冷靜的嚴肅的頭腦。因爲青年的「無所顧慮」的條件，具備着犧牲的精

神，而亦具備着篤學求真的勇氣。在實踐工作中，我們要培養出無量數的青年奮鬥志士，在文化領域內，我們仍須培養出大量的青年文化幹部。無論那一個激變的階段，都給與了思想家養成的充分範圍，讓批判的分析的思維過程向更高級的發展階段進展。青年在願力方面要自負，在態度方面要自卑，中國新文化的樂園正需要新的文化幹部去開闢。

第二，抗戰建國是中國的一段偉大的歷史，實踐的過程會把舊時代的傳統文化揚棄。文化青年的知識，便是抗戰建國的一個過程（知識是一個過程），所以這種知識的發展，客觀上不是自由主義的，才子佳人式的，風花雪月式的裝飾（封建的與資產階級的頹廢思想），而是現實主義的，戰鬥式的，新世界觀的。文化青年與時代文化的結合既然是真實的可能性的，那麼反時代的頹廢思想便成超現實的形式可能性。文化青年的主要工作，不是寫作中國歷史，而是在多方面文化內容上創造中國文化史。

第三，三民主義的理論與方法，是建國的原則，猶之乎馬克斯主義是世界革命的

原則。列甯文化階段，是馬克斯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斯主義，我們同樣亦可以說，中國現在文化階段是三民主義的發展階段，抗戰建國時代的三民主義，而負擔這種使命者，客觀上便落於青年文化幹部的頭上。我們反對曲解三民主義，我們要發揚光大並具體充實三民主義，這意見，在三民主義裏中山先生亦希望後起救國青年這樣做他的忠實信徒。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講演稿尙未完成，這種完成工作可惜在十數年來我們沒有盡到文化的責任。中山先生說：『吾人今日由舊國家變為新國家，當鏟鋤舊思想，發達新思想』。『必人人將舊思想全行消除，換入一副嶄新思想，方能成功』。所以文化青年應吸收世界最新思想以光大三民主義，並使三民主義有實現的可能前途。

世界法西斯國家把文化與科學都統殺了，最近荒木任日本文首便盡殺死文化的職責，仿效希特拉的反科學運動而更進一步。中國文化青年應照我們綱領的規定而自由地努力新科學運動，我們比法西斯的歷史是跑到前面去了！文化青年勉之！